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兼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觉

赵英红

摘 要: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互相补充”。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思想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支撑,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思想科学性、可能性的实践印证。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东方落后国家发展路径与前景进行了考察。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考察了英国对印度殖民的“双重使命”;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对东方落后国家发展的观点发生转向,提出俄国借助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中国现代化道路不仅将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引向现实,也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发展难题,完成了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实践问题,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问题,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三重性超越,证明了社会形态跨越论的科学性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道路; 东方社会发展; 继承与超越

中图分类号: A81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1)02-0018-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2.003

长期以来,西方以资本单向度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占据主导力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时并未明确提及“东方社会发展”概念。因此,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一直处于学界研究的隐性边缘位置。中国现代化道路处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链条之中,取得了显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1](P10)}。但是,国际社会仍旧存在着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质疑和否定的舆论,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质疑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学者唱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和未来前景。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及其合理性,同时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初步认识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过程中建立了唯物史观,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社会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探索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东方社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19ZDA0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辩证法研究”(BZX180018);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

作者简介: 赵英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zhaoyinghongqiqi@163.com (北京 100872)

未来发展阶段和本质趋势。马克思在综合考察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时代条件、不同国情等前提下，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开辟一条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另类发展道路。

资产阶级用大工业这一“利器”开创了世界历史，为东方社会融入世界历史、引起马克思的研究开辟了起点和渠道。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篇著作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思想。他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更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538)}。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解也是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基础之上。不断发展和扩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利用广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出于追求高额利润的目的在全世界开拓世界市场，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呈现一体化趋势、世界历史逐渐开始发展。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资产阶级凭借资本先天性力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野蛮民族一同卷入资本主义文明和世界历史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个世纪中创造的生产力使人类有能力征服自然力、制造并使用大机器生产，并且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使用化肥以及轮船和电报的发明与流行，都助力于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P36)}。因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迫使东方落后国家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动卷入按其要求和标准构造的“新世界”。

马克思正是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审视东方社会的独有特征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趋势。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方法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分析后，在《资本论》第一卷及其三大手稿中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观点。他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态演进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初始状态，而且东方社会具有西方社会不存在的横向社会结构。这一横向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土地公有、闭关自守的农村公社和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制度。马克思在吸取和借鉴了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条件对东方社会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重要影响的思想后，进一步指出东方社会这一特有的横向社会结构是由东方社会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进行人工灌溉等特有的社会经济、公共设施所决定的。正是上述东方社会具有的横向社会结构，造成了东方社会内部“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3](P679)}的困境，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干预维持社会生产和发展，而这也进一步束缚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换言之，东方社会这一缺乏主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导致东方社会国家无论过去在政治上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的整体社会结构、状况和特征都没有改变。

有些学者以此为基点，断言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在纵向发展上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其无法主动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社会内部无法生长出先进生产力。应当承认，在19世纪50年代初受历史条件限制和资产阶级学者观点影响以及世界历史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大环境中，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初步探索思想有其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19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马克思生活在德国，主要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了解关于东方社会的现状，如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述；二是19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期，马克思了解东方社会的途径主要是詹姆斯·穆勒、理查·琼斯以及法国医生和旅行家、英国外交官等提供的相关材料和个人著述。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了解有历史局限性，而且深受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混淆和影响。但是，不能将马克思的观点断章取义地理解成东方社会在纵向发展方面的绝对停滞性。“停滞的社会生活”、“活的化石”等词语只是马克思用于形容和描述世界历史发展中相比较而言暂时落后的一面，而不是专业、严格的学术用语，断不应该将其绝对化。19世纪50年代初，资本主义处于全球扩张阶段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初级阶段，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和对抗中，东方社会落后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丧失历史先进性和创造性，因

而也不可能产生出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实现自身社会形态的变革,绝不能将其歪曲误解成:东方社会无论如何发展、无论处于何种历史时期,都无法发展出先进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指出东方社会停滞并不是从整个社会领域而言,而是单就经济因素结构方面来说的。

此外,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东方落后国家被殖民之间的关系作了兼具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辩证评价。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殖民侵略最著名的论断是“双重使命”,即“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3](P686)}。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为西方殖民者辩护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价值理性层面看,马克思肯定了英国殖民者为印度这些落后国家输入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契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P683)}。马克思之所以作出这一肯定性的评价,一方面是因其用唯物史观来审视英国殖民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是因其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现实的人性就是由当下一切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总和决定,而且随着这一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从道德理性层面看,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社会侵略的罪恶行为。他认为英国殖民者使印度人民失去了他们原有的世界,遭受了具有一种特殊悲惨色彩的灾难。英国殖民者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不是完全为了印度人民利益,而是受极其卑鄙的利益的驱动,其谋取这一卑鄙利益的方式也是愚蠢的。因此,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统治的历史期间,对于印度来说除了破坏其原有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之外便再无什么作用。再次,马克思指出,不管古老社会的崩溃让我们感情上如何难过,最终都要回归到现实,又告诫人们感性和同情不能改变被侵略、被殖民的现状。如果东方落后国家不能有一个根本革命,不能从内而外来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也是“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3](P682)}。最后,马克思从世界历史高度进一步指出,东方落后国家的出路不是希冀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扶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既不会临时性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现状,也不会从根本上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蜜的酒浆。”^{[3](P691)}

综上,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分析和解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线,立足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视野,就西方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之间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作出的客观辩证分析。

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认识的转向

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最明显的是探索东方社会发展异于西方现代性道路的研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中。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论述是《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性批判的续卷。有的学者将这一转变论述为马克思的研究方向从经济学研究到人类学研究的转变,甚至将此定义为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研究断层。这两种观点只不过是现代实证科学分类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强加给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研究的再思考和转向,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从世界历史角度完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之前,人类社会也存在公有制。换言之,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对农村公社的研究是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之前人类历史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和命运的

“活化石”。1853年，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就提到过俄国农村公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详细地研究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仍旧未放弃对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的研究。在《资本论》第二卷整理完成后，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对俄国农村公社进一步研究，旨在厘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因此，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研究拓展，尤其对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是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理论批判的延续。

其次，巴黎公社和巴塞尔大会的革命实践促使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深入研究。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和平、稳定发展时期，东方社会发展进入革命的预备高潮期。世界革命形势出现了从西方转向东方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这一历史革命趋势，马克思的研究转向了对中国、印度和俄国等落后东方国家的分析上。与此同时，1869年，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开始关注并通过“土地国有化”的原则。但是，以瓦格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反对这一会议的决定，并提出俄国农村公社的瓦解是因为农奴制的废除。这种与马克思对立的观点使马克思更加关注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正是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挑战和疑问促使马克思开始思考东方社会发展前景：东方国家能否规避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潜在的问题和弊端，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再次，回答俄国国内民粹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部论战，统一俄国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的认识。1872年，《资本论》第一版在俄国出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引发了俄国知识界的争论和聚焦。这一概述成为俄国国内学者论证自己观点的重要论据。自由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表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表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换言之，俄国必然要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必须首先摧毁农村公社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反，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则认为，《资本论》中马克思针砭时弊地批判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合理性。因而，民粹派理所当然地把事情简单地理解为俄国农民是上帝的选民，进而俄国不必自杀就可以借助其内在的村社制度缩短发展历程。与此同时，1861年俄国沙皇改革后，部分被流放在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仍为俄国社会的命运担忧并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未来发展道路。“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70年代后，他们收到俄国革命活动家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来信多达140多封。”^{[4](P25)}以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为例。她给马克思写信，希望得到马克思的明确意见，“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5](P637)}。其实，早在看到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马克思就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示，不支持茹科夫斯基依据《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观点片面地理解俄国人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走过且正在走的发展道路。不过这封信并未发出。在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后，马克思才前后共拟了三封回信稿及最后正式复信阐述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文章中。1894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集中总结和阐述了他们对东方社会理论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人类学笔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早年在对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论述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内源性现代化道路“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6](P839)}。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反之，“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的一个最好机会，要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7](P464)}。马克思晚年也十分警惕“过度概括”的理论风险。他说，假如有人一定要把对资本

主义原始积累的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6](P342-343)}。那么,这不仅会给他带来太多的赞誉,也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侮辱。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的逻辑支点是世界历史发展,现实基础是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即农村公社。他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支点,俄国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避免经历资产阶级社会的“阵痛”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将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可解决的矛盾一同扩展到全世界。因此,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摆脱资本主义形式。俄国农村公社与印度公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印度公社是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印度必须发生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社会形态转型;与此相反,俄国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俄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使后者战胜前者”^{[7](P586)}。俄国农村公社内在“二重性”决定了这种原始生产方式能够成为新的社会起点的可能性。若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则这一特殊的土地公有制会赋予俄国社会强大的生命力,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抽象推理的假想,而是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第一,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时性存在,但不要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充满“血与火”的原始积累老路,而是能够吸收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物质基础和文明成果;第二,假如俄国革命能够“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P18)};第三,“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7](P590)}。

综上,马克思考察了处于东西交融的“世界历史”中的俄国农村公社,指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换言之,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走一条不同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道路的研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为东方落后国家在革命实践中重视主体现实性来探索另类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对东方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的发展与超越

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发展,没有止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探索俄国发展的时代,而是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的历史任务和价值皈依。虽然,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为过去的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并且中国自身不存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制度,自然也不会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且互相补充。但是,我们不能借此否定马克思这一设想和论断的内在真理性,“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P291)}。我们不应该拘泥于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设想的具体内容,而应该看到这一设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探索适合本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论关照和跨时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现代化道路,丰富和论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内涵。

(一) 中国现代化道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在方法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多维度分析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设想的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并不是忽略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仅凭农村公社这一制度就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其前提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7](P575)}。由此可见,这一另类社会发展路径也是要在社会基本运动规律这一唯物史观之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从而大力发展生产力。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金日成时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P10)}，强调社会主义要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勇于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中国现代化道路符合历史规律向前发展。不论历史条件多么复杂、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么多样，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是稳定的，在根本上不可超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方面，更体现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目标。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胜利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依旧要秉承马克思考察东方社会发展时的唯物史观方法论。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马克思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殖民不能使印度获得完全解放的原因是，被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印度生产力发展不归人民所有。在考虑俄国利用村社制度跨越“卡夫丁峡谷”时，马克思也强调必须要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国家给农民垫款维护农民利益，使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的劳动人民从小地块劳动过渡到集体劳动，从而以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苦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换言之，马克思考察东方社会发展前景和路径时将群众史观作为重要方法论，将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作为重要因素和标准。同理，中国现代化道路坚持群众史观的哲学指导，不是历史宿命论和历史目的论的抽象成果，而是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旨归。第一，解决好人民群众的需要。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定和解决都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建国初期的“落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赶超时代”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引领时代”，解决民生问题始终以解决“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为着力点和立足点。第二，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客观标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是否”标准，即“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8]。第三，落实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目标。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了人民幸福而奋斗一生的信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10](P214)}。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能抛弃的价值旨归。

第三，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丰富社会发展形态多样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的生产力。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只有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物质基础用到公社，俄国才有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思想体现了马克思批判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也为中国探索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和新思路，即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1](P71)}。对于私人的资本主义工业，毛泽东认为还要尽可能地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这才有利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促进社会发展^{[12](P1435)}。中国现代化道路中蕴含着革命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作为革命现代化的历史产物，丰富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也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前景的样态类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

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过渡社会形态,是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和桥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我国国情科学认识基础上,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创立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应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动态,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胸怀,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集世界各国人类文明智慧于一体并加以利用,反哺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内蕴的人类社会发展样态多样性思想。

(二) 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层面的多维批判与超越

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套用西方资本单向度逻辑支配下现代化道路的再版,不是苏联僵化模式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而是世界历史场域中内蕴中国唯物史观逻辑的新文明道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为中国现代化服务,实现了三个方面超越:实现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超越、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终止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谬论和“国强必霸”旧逻辑的超越。

第一,实现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是随着大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一种内源性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性的生成,不等于西方化。西方内源性现代化国家开拓的世界历史凭借其在时空层面上的辩证优势,以资本单向度主导的暴力性、殖民行动进行全球空间拓展,本质是资本逻辑支配下西方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样貌构建出的世界历史。所以,沃勒斯坦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世界,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13](P137)}。资本逻辑支配下单向度的现代化日益表现出难以解决的矛盾: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地区战争不断等问题层出不穷。因此,西方现代化的最终归宿是以破坏和牺牲他国利益而勉强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贪欲,必然是被历史大势所淘汰的。在西方现代化弊端日益暴露的困境中,我们不能因其历史性先发优势而掩耳盗铃地忽视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对英国殖民印度的批判中,鲜明地指出印度自身特殊的悲惨色彩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3](P679)}。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此暗喻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并不是适合所有国家,尤其是不能解决反而会加深东方被殖民国家的窘境。这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图景瞻望的思想为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开辟异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经验性警示和方法论指导。中国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分歧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本质原则、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根本目标,在充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的另类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

第二,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马克思认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路径需要同时具备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与西方社会革命运动“相互互动”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无疑是奢侈的,甚至是难以实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内隐着东方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性,甚至可以将马克思所言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这两个条件理解为仅适用于当时理想化的俄国现状。历史表明,俄国也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路径设想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是提出“一国胜利论”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巩固和强化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后来日渐暴露弊端。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盲目个人崇拜等弊端日益侵蚀着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后期自身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间接因素。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组织的胜利,而非纲领、制度或社会政策的胜利”^{[14](P587)}。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因此就站在它的对立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应综合利用、借鉴经验并加以超越。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提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前瞻性预想。鉴于马克思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宏观把握世界历史趋势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等理论和实践双重经验教训，中国现代化道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体现在：将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与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完美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借鉴、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服务；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外交方面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建构“一带一路”实践平台，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共享的国际交往空间格局。因此，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吸取、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础上，实现了质的超越。

第三，对人类社会终于资本主义制度谬论和“国强必霸”旧逻辑的超越。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3](P43)}。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基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资本”，这是它与生俱来的铜臭味，也是其必然灭亡的火种。抛开资本主义文明华丽的外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质上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指向牌，在当今国际社会上表现为国强必霸。资本的内在矛盾必然使其具有趋利性和扩张性特征。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不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后社会形态，对内产生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对外加剧世界的不安与动乱。西方学者将资本主义定义为“普世之光”，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论，必然会在历史长河中不攻自破。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谬论的终结的认识始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尤其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给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带来了避免经历资本主义阵痛而进入更高社会形态的希望，也暗隐着即使“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15](P348)}，但资本主义制度也只是人类社会形态中的一个阶段。马克思甚至预言，中国已经觉悟，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P628)}。马克思称之为“亚洲新纪元”，就意味着这不是重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老路，而是东方落后国家内部衍生出的一种新型社会发展模式。直至今日，这种“新纪元”不仅局限于亚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其真实面目也日益清晰，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资本第一性”的思维逻辑、“国强必霸”的狭隘眼界，坚定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指出，脑袋不要“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16](P147)}，“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10](P501)}。

四、结 语

中国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能“行”？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一新型现代化道路不是历史目的论或历史宿命论的抽象异类，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应用和创新，是对苏联僵化现代化模式和西方现代化道路一元性、人类社会终于资本主义谬论、“国强必霸”旧逻辑的突破与超越。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17]。因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用实际行动驳斥质疑中国现代化道路合理性和国际上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舆论，用实践成就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崭新模式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王继荣. 走出“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误区[J]. 科学社会主义,2004(2).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 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 盯着抓反复抓指导抓出成效[N]. 人民日报,2016-02-24(01).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精粹[M]. 黄光耀,洪霞,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4]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6]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7]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0-10-30(01).

Research on Marx' s Theory of Oriental Society Development

— Also on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odern Road

ZHAO Ying-hong

Abstract: Marx theory of oriental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road complement each other. Marx' s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the road, and the road is the practical proof of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possibility of the theory. Marx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prospect of the backward oriental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1850s, Marx examined the dual mission of British colonization of India. In 1870s, Marx' s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ckward oriental countries changed, and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Russia crossing the Kaftin Valley by means of rural commun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not only leads Marx' s theory of oriental society development to reality, but also solves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practice, thus completing the method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is a practice issue, not an abstract theoretical analysis issue. In practice, it has achieved the triple transcendence of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path, which prov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social form leap-over theory and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path.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road; development of oriental societie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责任编辑 孙 洁)